

***Betting o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Lottery in Late Qing China.* By EN L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386pp.**

*Betting o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Lottery in Late Qing China* 一書，是美國達拉斯德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黎恩博士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於2023年8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由強烈的問題意識主導，所解決的大問題是「闈姓如何引起晚清社會變化。(How the lottery produced changes in late Qing China)」作者所關注的是人，除闈姓歷史梳理外的各章節背後都有與闈姓相關的主體：經營闈姓的廣東商人和投注闈姓的百姓、政府官方（清廷與廣東政府）、士大夫精英階層以及海外廣東移民群體。圍繞這些主體，作者提出的問題有：闈姓玩家如何下注，他們有什麼策略？闈姓商人獲得哪些好處，他們又必須考慮哪些意外情況？官方如何應對闈姓，他們又如何的道德與現實之間做出選擇？對於離開中國的移民來說，彩票只是消遣還是嚴肅的金融冒險？這是一部讀來引人入勝的史學著作。除緒論外，全書共7章、386頁，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一、二章組成，解決闈姓的來源和影響問題。第一章處理遊戲、賭博和彩票的歷史沿革問題。中國的賭博、彩票和遊戲源遠流長、花樣百出、變化不拘，既容易眉毛胡子一把抓，又難以廓清其演變理路，巧妙的是，作者選取3個角度加以闡述：一是博弈思維的培養如何從先秦思想家處得到肯定與支持；二是賭博是如何組織化、標準化、規模化，以及廣東為什麼賭風最盛；三是遊戲和賭博如何從精英階層的消遣變成大眾的娛樂方式。一個亮點是作者從物質史角度入手，印刷文化興起以後的遊戲和賭博類型，為彩票的誕生奠定物質基礎。第二章處理闈姓及其他彩票如何建構共同體的問題。首先，梳理與闈姓的產生直接相關的白鴿票和花會簡史，二者為闈姓的開展提供組織結構、運行機制及受眾信任基礎。其次，闡述與科舉直接相關的闈姓興起原因，詳細介紹闈姓相關的收據、公開校對、結果揭曉、獎金和利潤分配等各個關節情況，闈姓的組織方、印刷廠、分銷商、跑腿、玩家等結成一個巨大的社會網絡，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凝聚力。再次，介紹花會——舊有的賭博類型，闈姓之外的鋪票——一種為公共工程籌款的公益方式，等等。白鴿票、山票、花會和闈姓固定時間的開票方式，使投身於此的人們共享同一時空，具有安德森所說的「共時性」(simultaneity)，而這

一共同體的建立一方面使得婦女兒童有機會參與社會事務，另一方面促進社會逐漸脫離陳腐的禁賭輿論，改變彩票是剝削的觀念。

第二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組成，涉及與廣東闖姓相關的各個主體。處理完闖姓的歷史來源及其社會效應等問題後，作者在第三章詳細闡述闖姓及花會的具體運作方式以及彩民的投彩攻略。一方面，闖姓像科學考試一樣具有不確定性（甚至都需要一點運氣），需要認真的參與者花大量精力做準備，收集、分析和運用科學選拔方式、應試人員履歷、往屆開獎結果等信息，權衡背後的權力關係，推測出投注對象。另一方面，闖姓的分銷商為吸引客流，出版各種免費指南，幫助彩民選擇姓氏。因此，闖姓和其他彩票背後隱藏的心態挑戰了此前鼓勵人們安於本分、履行既定社會角色的教義，也就是說，闖姓等彩票給普通百姓提供了超越原先社會地位的機會。

第四章涉及1861—1884年間政府對闖姓的監管問題。大致分為兩個時段。1861年至1863年，因太平天國兵燹、天災等因素造成財政收支極度不平衡，戶部出臺一系列補救措施，允許各省就地籌餉，增強地方財政自主權，廣東承擔財政籌款重任，上奏請求臨時開放闖姓兩年，獲得朝廷允准，用以重建貢院。1863—1884年朝廷以禁止闖姓等賭博重申對地方的控制權，然而廣東的財政問題日益嚴峻，多任廣東巡撫以罰款或認捐的名義從闖姓和其他彩票商處獲取釐金，最終於1884年，朝廷同意在廣東再次開放闖姓。作者認為，闖姓的弛禁體現出地方政府與朝廷之間的博弈，1884年允准闖姓顯示出中央和地方在變通籌餉過程中的協商，闖姓捐成為金融創新的典範。不過，朝廷允准闖姓是在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1885年1月13日（趙利峰，《晚清闖姓問題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2005，〈緒言〉，頁1）。第五章中，作者選取1885年惠州科場闖姓舞弊個案，討論與科學息息相關的闖姓在獲得官方許可後產生的影響問題。儘管闖姓導致的科場舞弊情況嚴重，甚而在廣東弛禁闖姓後，引發惠州民眾衝撞府衙的騷亂，但清政府和廣東地方政府都盡力採取措施維護科舉的公信力和闖姓的合法性，如嚴厲處罰舞弊案的始作俑者，委派作風清廉、百姓愛戴的官員主持大局等，暴露了廣東乃至朝廷財政對闖姓的依賴，反映出晚清中國財政狀況的嚴峻程度。

第六章聚焦張之洞的經歷，探討闖姓對晚清精英階層的影響。1884—1889年，張之洞在廣東利用闖姓承充商解決廣東的財政問題，以他為代表的精英階層在道德上較為靈活，尋求切實可行的方法引導民眾行為，並與商人合作，創辦第一批現代學校和工業項目。而高中進士的劉學詢想盡辦法承充闖姓，並且與澳門等地的彩票商合作經營，成為一方首富，社會地位非同一

般，也反映出精英階層新的身分認同。闈姓等彩票為新的精英階層提供除科舉以外的職業道路。

第三部分，即第七章。此章討論的問題已經超出闈姓，作者以東南亞和北美為例，介紹海外廣東人群體的賭博現象、賭博形式以及所起的作用，認為此一現象並非由就業問題導致，而是廣東人本身的賭博傳統，也就是說，這種賭博現象並非闈姓等彩票的海外擴張，而源自廣東移民的流動性。從廣東出去的移民大多是單身漢，他們由賭博聯結成社群，共享習俗、方言、宗教信仰、關切和記憶，形成跨越國界、跨越代際、具有全球規模的共同體。

中國的闈姓問題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10年代初較為火熱，這些研究基本釐清了闈姓產生的時間、產生的原因及闈姓發展史，並在此基礎上，做了一些社會史和文化史方面的拓展研究，較為系統的成果是趙利峰的博士學位論文《晚清粵澳闈姓問題研究》（2003）及其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晚清闈姓問題研究》（2005）。將近10年後，黎恩的著作 *Betting o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Lottery in Late Qing China* 再一次將闈姓帶入讀者的視野，從心態史、物質史、經濟史、科舉史的角度，重新審視闈姓以及相關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問題，給人啟發。

着力聚焦底層人物，富有新意。此前的闈姓問題研究着重在朝廷如何弛禁闈姓以及闈姓商人如何獲得承充資格上，偶涉闈姓玩家也只為說明闈姓投注規則，但作者認為，闈姓不僅僅是廣東官員和闈姓商人之間的博弈，同時也是經營闈姓的商人之間、以及投注闈姓的百姓之間的競爭，由此從微觀角度闡明闈姓對廣東（或中國）百姓產生的影響。例如，作者在第三章中主要敘述底層百姓投注闈姓的具體策略和方式，又在講述花會賭博時，利用《清稗類鈔》等材料，講述女性如何機智地利用花會商人的心理來投注花會獲利，體現女性走向公共空間的一種方式（頁142—143）。為數眾多的闈姓投注者並沒有留下足夠的材料，然而作者通過闈姓商人免費印發的投注指南，以及相關史料，盡可能建構出廣大投注者的能力、策略和心態，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重新審視精英階層，考察細緻。作者並沒有繞過研究已經眾多的士大夫精英階層，選擇張之洞（1884—1889年任廣東巡撫）和葉大焯（1884—1885年任廣東學政）為個案，研究闈姓問題在當時對兩種官員的影響，張之洞因開放闈姓、大幅度緩解財政壓力而獲得升遷，說明徵收財稅的能力成為中央考核官員的新標準，由此形成士大夫精英階層新的身分認同。在細節上，張

之洞奏辦的湖北「簽捐票」，往往被研究者認為是中國第一官辦彩票，是受呂宋票的啟發而來，作者指出，張之洞在此之前已經有奏辦闈姓彩票的經歷。葉大焯則是闈姓導致科舉舞弊現象的受害者，第五章作者敘述闈姓引發的惠州科場舞弊案件時，利用《軍機處錄副奏摺》等檔案材料，盡可能還原學政葉大焯在事發後如何秉公處理的過程，認為清廷以失察革他的職已屬從輕處罰，而葉大焯為顯示自己的清白，選擇歸隱（頁175—178）。張、葉兩位官員的遭遇對比，顯示出當時社會經濟已瀕臨崩潰，作者的研究彌補了一些細節。

除了上述引人注目的特點外，該著作也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比如，主題被稀釋的問題。書名顯示其研究對象是押注科舉結果的闈姓彩票，然而除去敘述闈姓彩票產生歷史的章節外，每章都有白鴿票、花會、番攤等其他賭博形式的論述。同時，第七章所論述的華人移民賭博現象問題，並非闈姓問題的延伸，如此種種很大程度上衝淡了書名所提示的研究對象——闈姓。再如，諸多報紙媒介上關於闈姓的廣告和闈姓結果（中獎信息）的告示等信息，在流通過程中對大眾產生的影響，也是可以繼續挖掘的一個方面。

總覽全書，圖文並茂，作者挖掘諸多實物照片，呈現出具體而生動的闈姓及其他彩票的歷史面貌，幫助讀者理解並進入那段歷史。此書對於豐富學界對廣東闈姓問題的理解無疑具有參考價值。

馮玉霜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楊田，《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人類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5年，241頁。**

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王村鎮的完顏村，自稱是金朝皇室後裔，為躲避「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附錄1，〈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頁327）的嚴令，以「守墓人」身分在此隱居了800餘年。隨時間的推移，完顏氏後裔不斷調整、轉換甚至重塑家族內部的集體記憶。楊田的《關隴地區完顏氏後裔的人類學研究》正是以該地區完顏氏後裔的家族記憶為「社會記憶文本」，從個案角度「探討歷史記憶與現代社會語境下建構的現實關係」（頁1）。